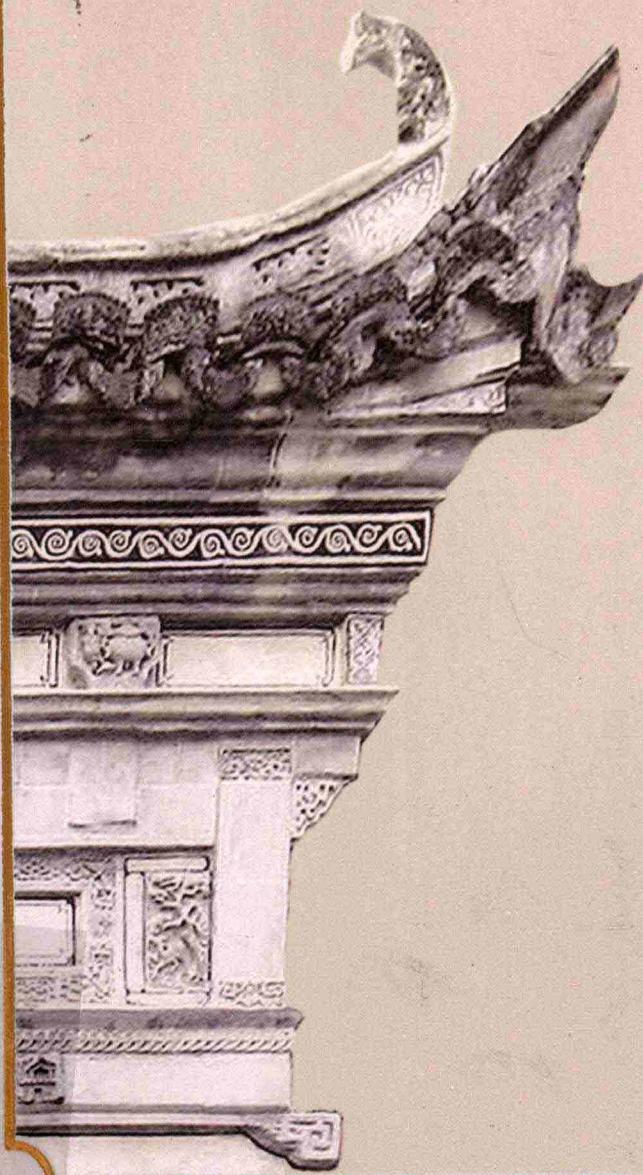


言行一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汪寬也 近代徽商



言行一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近代徽商

汪寬也

图书代号 SK12N04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徽商汪宽也/言行一著.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总社有限公司, 2012.7

ISBN 978-7-5613-6389-8

I. ①近… II. ①言… ②张… III. ①汪宽也 (1866 ~
1925)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9367号

近代徽商汪宽也

言行一 著

责任编辑 颜 红

责任校对 赵荣芳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172千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6389-8

定 价 35.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传真: (029) 85251046

『发展农业，土布免税』

——汪宽也先生的毕生追求（代序）

汪光焘

本书主人公，我的曾祖父汪宽也，出生于晚清时期徽州休宁县。我过去对曾祖父的身事知道得很少，只是小时候听父亲说，曾祖父少年时便由徽州到了上海，在祥泰布庄当学徒，后来当了上海布业公所总董，后人为他立了纪念碑。

2000年初，我在北京市任副市长时，率北京市城建系统有关部门和部分区县主管领导去上海学习城市建设经验，在上海豫园市政府接待处小憩时，听时任上海豫园管理处主任刘群介绍，这里原名绮藻堂，曾是上海布业公所（亦称上海布业公会或上海土布公所）旧址。我十分惊喜，便请他帮助收集有关上海布业公所的档案资料。刘群不负嘱托，数日之后便给我寄来一些上海布业公所档案资料复印件。令人喜出望外

的是，其中一份是存于上海档案馆的上海布业公所署名胡方锷、李庆熙暨全体同业为汪前总董宽也先生所立纪念碑的缩影复印件，文中载明“乙丑（1925年）四月十一日行落成礼，影印原碑分赠，用留纪念。上海布业公所附记”。

碑文对曾祖父汪宽也的生平作了扼要介绍，称颂“汪公为人直爽，严于律己，勇于承担公益事业，以布业非减轻负担不能发展，创议免除厘金税，争取布业生存发展权益”。赞扬“汪公任总董十余年，先后如一日，事无巨细，都要亲力亲为，所采取的兴利除弊措施，皆关乎布业前途命运。哀悼汪公不幸病逝，追思往绩，令人怜怀不已”。我仔细研读碑文，细看了上海档案馆的复印材料，无论清朝末年，还是民国初年战乱时期，多处记录“免征厘金及营业税，实因土布位农家赖以生存独有之织业，且为劳苦贫民采用之衣料，行銷愈广产量愈增，则农家之副业愈益发达，农家所沾之实惠愈多，即用土布之劳苦阶层可得价廉质坚之衣料，其间接受益匪浅”这节文字，并在致当时上海社会局局长的文稿边上空白处批注了“发展农业，土布免税”八个字，这个批注代表了汪宽也先生的毕生心愿。我对曾祖父汪宽也做人做事的精神肃然起敬，萌生了希望更多地了解他的生平往事，从而为他写一本传记的念头。

我开始注意收集资料，同时也接触了几位热心徽商文化的人士。2011

年初夏，在一次与我的好友、北京市丰台区区长冀岩和徽商文化研究者沈基前等的会面交谈中，了解到安徽每年都在举办徽商大会，他们很想在大会开幕之际编撰出版在历史上有影响的徽商人物的传记。我随即请他们看了汪宽也生平简介和上海布业公所纪念碑缩影复印件，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提出请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兴无策划，由传记作家言行一执笔，赶在徽商大会前完成汪宽也先生的传记。这正是我多年的心愿！

本书作者言行一，本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尊重历史的精神，以极大的热情，对汪宽也先生的生平进行了广泛的史料考证和多方面采访，其间得到了安徽省休宁县地志办主任汪顺生和汪宽也先生后代汪光炜、庞乾椿的支持、帮助，历经寒暑，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作者夜以继日，勤奋写作，使这部史料翔实、脉络清晰、描写细腻、人物栩栩如生的传记《近代徽商汪宽也》如期出炉，真实记录了一位一生恪守诚信，具有卓越人格魅力，信奉乐善好施，坚持以义取利的近代儒商形象。通过对汪宽也先生一生故事的叙述，读者也可以仔细寻觅清末民初时代的徽商踪迹，感受到一段难以忘怀的近代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

汪宽也先生，生于公元 1866 年，卒于 1924 年（农历甲子年腊月，公历 1925 年 1 月）。他出身于读书人家，父亲是当地公推的“学长”。十四岁时，他远离父母去上海祥泰布庄学生意。他一生勤劳、善学、执

著、诚信，无论是当学徒，任经理，还是在任布业公所总董期间，对土布行业倾尽心力，为民族工业奔走呼号，为农民谋生计，至今对人们仍有许多教益。

一是为“发展农业，土布免税”而努力奋斗。清朝末年革命烽火四起，民国初年战乱不断，苛捐杂税奇多，官员责令布商出运输费名曰津贴。汪宽也先生视津贴为苛政，为之抗争，最终迫使清廷和民国政府撤销积年弊政。他创议免除厘金税，坚持布业非减轻负担不能发展，全国布商闻风响应，他案头相关的公文、信函累积有一尺多高，终使免税成功，后又延长免税期限多年。浙奉战争期间，当地百姓房屋倒，纺车毁，田地荒芜，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汪宽也先生提议提高布匹收购价格，呈文为百姓请免布税，以赈恤灾民。为发展农业，他决定在同业中集资补贴给织布的乡民，“俾使回里，仍事耕织”，这些措施，不但让百姓得以喘息，布业经营也相对稳定下来。

二是坚持质量标准和优质品牌理念。汪宽也先生任上海祥泰布庄经理后，便开始推行合同销布模式，规范了祥泰土布标准，严格了技术和质量标准，无论是经纬纱、支数、幅度、长度、紧密度，还是外观和包装，都有统一规定。他还创意打造出专属于本号商标的“祥泰牌”毛蓝布及头巾、被单、青花蓝布帐等系列产品，不仅以质优价廉行销全国，还将市场

拓展到东南亚和欧洲。担任上海布业公所总董后，汪宽也先生的这些经营理念，在上海土布行业进一步发扬光大，从而对土布行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是具有爱国爱业的宽广胸襟。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向中国的挑战和侵入，汪宽也先生除了自身调整产业以应对外，对其他民族工业企业无不给予关怀和支持。在汪宽也经营祥泰布庄所属的两座钱庄期间，偶遇无锡工商界巨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因开办面粉加工厂资金匮乏遍寻资金无着，出于爱国热忱，他毫不犹豫地为荣氏兄弟奔走、斡旋，从祥泰的两座钱庄贷出十万银元，贷期三年，立解荣氏兄弟燃眉之急。后贷款到期无力偿还，汪宽也又放宽贷款期限至十年，使荣氏兄弟的企业得以宏图大展。这一情节，充分表现出汪宽也先生的宽广胸襟。

《近代徽商汪宽也》一书即将付梓出版，通过这部人物传记，读者可以了解到这位近代儒商身上所展现的崇高思想、品德和人格，从中得到共享，这也是我的希望。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日于北京

壹

一	泪别学塾	四
二	祥泰东家汪厚庄	五九
三	家道中落	〇四四
四	祖孙情深	〇一五
五	○二七	

休宁少年郎

相识徽商（引子）——〇〇一

目录

貳

十四	绝处逢生难		二一三
十三	打掉津贴和厘金		二〇二
十二	整顿牌谱		一八七
十一	土布公所		一七六
十	先开钱庄，后开当铺		一五八
九	创出了风靡市场的祥泰毛蓝		一五八
八	踏访三林塘		一二四
七	拍案而起		一一〇
六	看布师傅		○九七
五	布庄来了个汪宽也		○七三
			一五一

上海，一位土布商人的故事

叁

廿一	雁过留声		二七七
廿	魂归何方		二七〇
十九	沪上无佳音		二六二
十八	殒弟之痛		二五七
十七	再做孝子		二四七
十六	重返故里		二三七
十五	作别沪上		二二三

偶然回到了清末民初（代后记）

二八三

甲子悲情

徽州，位于安徽省西南部，简称“徽”，古称歙州，又名新安。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为徽州，从此历宋、元、明、清，统一府六县（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目前，婺源归江西，绩溪划宣城，其他诸县为1987年由徽州地区改建的黄山市所辖。徽商，即特定时期从徽州走出去的商人，这个特定时期大体可分为南宋兴起、明清兴盛、清末民初衰落等几个阶段，约五百年之久。

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借着经商的名义从事文化与教育，称之为“儒贾”，表面从事文化传播而实际做生意，则叫“贾儒”。或者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商人，或者是具有一定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显示了徽商的特色：贾儒结合、文商交融。



山多田少的徽州

中国地大物博，各路商人众多，为什么独独皖南的徽州会出现贾儒结合的“徽商”，并发展成为明清时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商帮呢？

古徽州所属六县，地形地貌几乎如出一辙：放眼望去，青山茫茫，无数溪流于青山中奔腾而出，天下最著名的黄山也在其中。从旅游的角度看，山清水秀，云雾缭绕，是个很不错的地方，历史上有多少诗人和画家在徽州流连忘返，从而创作出无数传世佳作。

徽州的黎民百姓不是偶然路过的诗人或书画家，他们的第一需要是吃饭穿衣。可是徽州山多田少，“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即使其中的“一分田”，也多是山地，土质差，面积大小不一，长长短短、高高低低，水利灌溉无保障，不适合耕种庄稼，尤其是不宜种稻米。农民种的玉米，丰收之年，亩产一两百斤算好的了，收成抵不上苏浙荒年产量的一半。碰上几个月不下雨，或山洪暴发，颗粒无收不足为奇。

然而，就是这样的不利生存条件，也没能阻止诸多外来人口源源不绝

地移居徽州。

处于江南绵绵大山中的徽州，在战乱频繁的古代中国，竟然成了躲避战乱的“避难所”。中原历来为政治和军事是非之地，违抗君主旨意的叛逆者、宫廷政变失利或军事政变失利者，面对诛连九族的灾难，被迫拖儿带女逃亡避难。逃亡者自中原向南方逃跑，越过长江天险后再行十天半月，便进入犹如迷宫般的徽州群山。这样的迁徙，每次中原战事、动乱之后都会出现，西晋的“永嘉之乱”、唐末的“安史之乱”和北宋的“靖康之变”，其后均引来移民高潮。一拨拨面容憔悴的中原世家大族扶老携幼，从北方匆匆忙忙地走进群山环抱中的徽州。徽州人对于落难者以诚相待，帮他们解决米和柴，还帮他们开荒种田，一代又一代，流亡者慢慢成了“老徽州”。

外来人口数次大规模迁入，再加上本地人口自然增殖，使徽州的总人口急剧增长。徽州本地粮食只能维持所需的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要靠粮贩从外地运入。明清交替之际，缺粮问题更加严重，运米的船只一天不到徽州，有人家中无米可煮；三天不到运米船，路边会有饿死的人；要是七八天米船不到，街头就会发生抢夺食物的事情。即使粮商的运米船能够及时运到，米价十有八九暴涨，百姓买不起。缺钱，成了众多徽州人生存的症结。

清人洪玉图在《歙问》中说：“歙山多田少，况其地瘠，其土骍刚，其产薄，其种不宜稼粱，是以其粟不支，而转输于他郡，则是无常业而多商贾，亦其势然也。”在这种情况下，徽州人开始反思：与其一窝蜂地挤在徽州山中坐以待毙，还不如走出徽州，去寻找经商之路。同时，明代中期，毗邻徽州的苏浙已经逐渐成为中国最富裕、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徽州山地多产良材，又是重要的产茶区，漆、纸、墨、砚等土特产也名声在外，为什么不去利用这些有效的资源呢？于是，徽州人开始脱离“农桑”，走上“以贾代耕”的道路。

在历史与环境的逼迫和催化中，以木、茶、盐和典当为主业的徽商应运而生。

靠山吃山，徽州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吃苦耐劳的木材商。

徽州地处万山丛中，大自然赐给徽州人山林竹木之利，杉树、楠树、樟树、青檀、杜仲和毛竹，满山遍野，茁壮成材。徽州产的杉木，木理通直，坚韧耐腐，是上等建筑用材，毛竹也是建筑和编织的好原料。每当冬季来临，新兴的徽州木材商便组织农民入山伐木，待到梅雨季节，将无数木料和毛竹扎筏，利用河水涨泛的力量运载出山。或由新安江运到杭州；或由青弋江流入长江，运到芜湖和南京；或由阊江流入鄱阳湖，进入江西。木材销完之后，再把大量的粮食和布匹运回徽州，又赚一笔钱。一根上等大木料出山时不值一钱银子，而运到浙江后就能卖到二两银子。除去关税、运费，至少还有十倍的利润。据称，杭州候潮门外，徽商用于堆放木材的场地曾达到3600亩，其弃船登岸处被称为“徽州塘”。

江中财源滚滚来



经营木材生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上好的木材大多生长在深山老林中，道远山深，采伐困难，采伐后运送下山也十分艰难，水漂的过程充满危机，一不小心出了人命，商人就会受到巨大损失。但是，木材经营的巨大利润，仍使众多的木材商铤而走险。

茶叶，是徽州特产，徽商的眼睛自然不会放过茶叶生意。从明代起，徽州商人开始走向全国，四处经营茶叶。诗人白居易在他的《琵琶行》中就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诗句中的“浮梁”，即原属于祁门县的产茶重镇，这说明，早在 1100 多年前的唐朝，祁门茶叶就已经卖到了皇家驻地长安。

徽商经营茶叶的形式有四种：茶号、茶行、茶庄和茶栈。茶号相当于茶叶精制厂，商人从农民手中收购毛茶，运到茶号内进行精制后运销；茶行类似于牙行，代替茶号进行买卖，从中收取佣金；茶庄乃是零售商店的模式，以经营内销茶为主，也少量出售外销茶；而茶栈一般开设在上海、广州等具备外销口岸的城市，主要是向茶号贷款茶银，介绍茶号出卖茶叶，从中收取手续费，有时候也会将茶叶销到外国商人手中。

徽商茶庄所经营的茶叶，在明代即运销到今天的北京、天津一带，之后遍及东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和上海。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徽商茶庄星罗棋布，大量销售松萝、大方、毛峰、烘青、炒青等数十种徽州茶叶。1840 年鸦片战争后，徽州茶叶交易慢慢转移到上海。到清末民初时期，婺源、休宁、歙县三县的茶叶通过新安江运到屯溪，茶商纷纷在屯溪设立茶号，精心研制的“屯绿”在国内一路畅销，后销往欧美等国。1920 年，屯溪“屯绿”品牌茶号达 109 家。

徽商的第三大行当是盐业。徽商主要从事的木、茶、盐、典当四大行业，获利最大的就是盐业。徽州人涉足盐业，从明初开始。明朝推翻元朝之后，为防止元朝残余势力侵扰，朱元璋在北方边疆建立了若干军事重镇，派去了大量人马驻扎守卫。当时明王朝国库财力不足，为了解决数十



清代制茶图

万人马的后勤供应，朱元璋便采用“开中制”，让商人们把内地的粮食运到边防，然后官府付给商人“盐引”。这种“盐引”，相当于官方制作的“盐票”。盐是国家的重税商品，一向由官方严格控制，私自运盐、贩盐违法，抓住要治罪。而手中有了官府发给的“盐引”，意味着允许他们可以通过出售“盐引”从事盐的生意，无贩卖“私盐”之嫌。

利用“盐引”赚取差价，对于商人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自此，一部分徽商为利益所驱，全力以赴地做起了盐的生意。到了明末清初时期，徽州的盐商们已形成集团，控制了淮盐的产、供、销特权，从中攫取的利润十分惊人。以每引三百斤，销盐一斤获利三十文钱统计，那么销盐一引，就可获利纹银九两。以淮盐每年销售量一百四十万引计算，利润就有一千二百万两。

独家经营的高额利润，对徽商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明嘉靖至清乾隆期间，80名在扬州做盐生意的客籍商人中，徽商就有60名，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三。浙江的35名客籍盐商中，有28名是徽商。可见徽州盐商在盐业界所占的比重非同一般。歙县人江春，乾隆时期成为两淮八大总商之